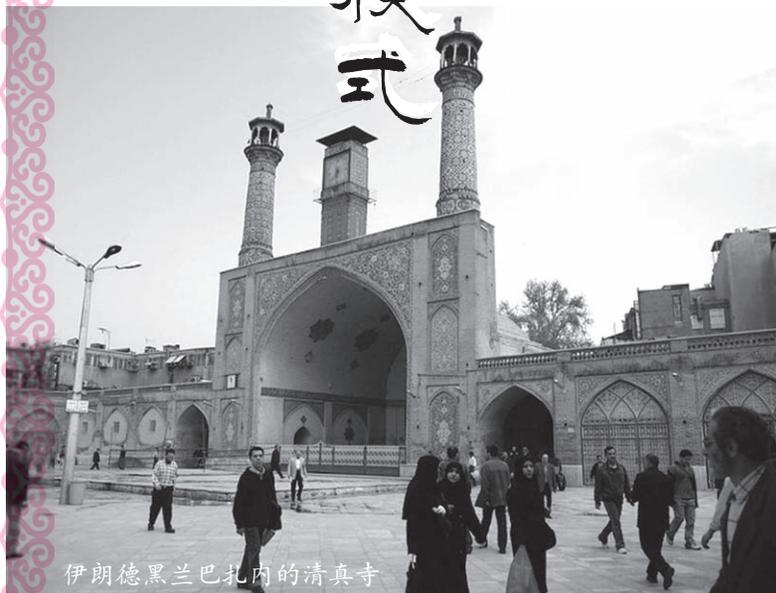




寺市并存

伊斯兰经济文化生成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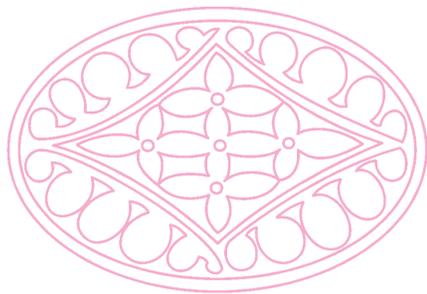
□ 马丽蓉



伊朗德黑兰巴扎内的清真寺

阿拉伯民族自古就以重商善营而闻名，在阿拉伯半岛形成了以欧卡兹集市为首的许多集贸市场：前伊斯兰时代半岛各部落民众每年11月在位于麦加南山谷地带的欧卡兹举行为期20天的集会，掌管克尔白神庙的古莱氏贵族利用集市交易机会与各部落加强联系，以吸引更多信众在集市后前往麦加朝拜克尔白神庙。结果，随着欧卡兹集市的日益兴隆，麦加克尔白神庙的地位亦随之提高。古莱氏人从经济、宗教、政治等方面不断获益，6—7世纪时麦加就成了阿拉伯半岛上无可争辩的经济、宗教和政治等中心，被誉为阿拉伯人谋生与致富之途的“汉志商道”必经麦加。伊斯兰教鼓励穆斯林远行经商（《古兰经》16：14），但阿拉伯民族在对外扩张的百年间却无暇顾及商业，通晓阿语、波斯语、法语和希腊语的犹太商人则在东西方各国的经贸往来中不断获利，一直到阿拔斯王朝前期哈里发哈伦·拉希的时代，随着阿拉伯帝国对外扩张之势的趋弱，内外社会环境转入安定，才逐步扭转了犹太人的商业垄断地位，形成以巴格达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陆上商道和海上贸易。再加上每年有大量穆斯林借助陆路和海路前往麦加、麦地那甚至耶路撒冷朝觐，能够大规模运送朝觐者的海船、骆驼商队、商号和集市应运而生，由三大圣寺搭起的精神帝国

和希腊语的犹太商人则在东西方各国的经贸往来中不断获利，一直到阿拔斯王朝前期哈里发哈伦·拉希的时代，随着阿拉伯帝国对外扩张之势的趋弱，内外社会环境转入安定，才逐步扭转了犹太人的商业垄断地位，形成以巴格达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陆上商道和海上贸易。再加上每年有大量穆斯林借助陆路和海路前往麦加、麦地那甚至耶路撒冷朝觐，能够大规模运送朝觐者的海船、骆驼商队、商号和集市应运而生，由三大圣寺搭起的精神帝国



创造的伊斯兰“朝觐奇迹”也带动了穆斯林的海外贸易。可以说，从阿拉伯部落民众朝拜克尔白神庙到世界各地穆斯林数百万的大规模朝觐，穆斯林精神王国不仅满足了每个朝圣穆斯林的信仰诉求，还为汇聚在三大圣寺的穆斯林商人提供了难得的商机，有力地促进了跨洋贸易、陆路经济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结果，麦加与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开罗等一并成为连接中东、非洲、印度和中亚等地的跨地域贸易中心。

如果说，先知穆罕默德以其成功的经商经历和执著的信仰追求而成为阿拉伯民族“经商、信教”文化传统的个体典范，那么起步于欧卡兹集市和克尔白神庙的阿拉伯商人则在经训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借助朝觐商路与海外贸易又将这一文化传统加以弘扬，伊斯兰信仰维系下的商品经济团体的出现便以清真寺在世界各地的出现而显示出伊斯兰文明世界化的坚实足迹。

二

“经商、信教”的文化传统影响了穆斯林不断追求“两世吉庆”的生存目标，清真寺与集市并存则最大程度地兼顾了穆斯林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双重诉求。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常被用来特指集市的巴扎多围绕一个聚礼清真寺或一座城堡而建，进而扩展为穆斯林社区。这种基于宗教认同所结成的穆斯林社区又成为伊斯兰城市的基本构成单位。早在中世纪，穆斯林就意识到，伊斯兰城市具有两个焦点——聚

礼清真寺与市场，“寺市并存”构成了伊斯兰城市中心，相对独立的宫殿与较隐蔽的穆斯林居住区则与城市中心互为辉映，形成了城市基本社会格局：宗教中心（清真寺）、政治权威（宫殿）、市场（经济中心）以及居民区（民间社会），象征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并存，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中心也相伴而生。正是由于巴扎和清真寺之间存在着如此密切的关联，城市活动就常以大巴扎和聚礼清真寺为原点向外辐射，甚至在巴扎和大寺并存的特定社会空间内还滋生出不同的伊斯兰亚文化，如新疆伊斯兰文化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就和著名的艾提尕尔大寺与西北最大的南疆大巴扎并存有关。

具体而言，“寺市并存”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为“寺市相邻”型：被誉为“世界典范广场”的伊朗伊斯法罕的伊玛目广场就是此类的典范。东西南三面依次耸立着罗特夫拉清真寺、阿里考普宫和伊玛目清真寺，广场上常举行集会和比赛等，广场四周集市上多为商店和作坊。因此，伊玛目广场因宗教（罗特夫拉清真寺）、政治（阿里考普宫）、经济（集市）和民间（伊玛目清真寺）四大社会基本要素的有机结合而囊括了阿拔斯王国统治的时代风貌。二为“市中含寺”型：除设商行店铺外，伊斯兰国家的重要集市内还设有客商聚会、礼拜之地。如叙利亚哈米迪亚市场不仅东西相连于倭玛亚大清真寺，还内置小清真寺，成为“市中含寺”的典范。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最大市场内，也配有规模不等的清真寺、祈祷室等。三为“寺中蕴市”型：据记载，在不影响正常礼拜的前提下，历史上的一些清真寺也被允许入寺交易某些小商品，寺院经济的存在又凸显出清真寺已然具有隐性经济实体的属性与功能，朝觐经济的发展更是广义上“寺中蕴市”的典范。据报道，每年数百万人朝觐圣地，有力拉动了沙特经济的发展，仅每年朝觐收入就约占其GDP的4%，朝觐期间的各种活动又为沙特人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朝觐者不仅

拉动了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三大圣寺所在城市的朝觐经济，还借助朝觐这种特定宗教文化活动和穆斯林大聚会的良机开展跨国贸易，加强国际沟通。因此，三大圣寺，既是宗教祈祷与纪念先祖的场所，也是文化交流、商贸洽谈的平台，更是各国开展民间外交的政治舞台。

可见，在“寺市并存”基础上形成了穆斯林社区，以穆斯林社区为基本单位又建成了伊斯兰城市。其中，清真寺和集市分别成为神圣性与世俗性的象征符号，两者不只在空间上并存，更在于集市上的经济活动要受到清真寺伊玛目所宣传的伊斯兰经济思想的制约，进而彰显出伊斯兰经济文化与穆斯林特定生存环境间的内在关联性。

三

圣训中“信赖真主，同时拴住骆驼”的寓言，折射出阿拉伯民族的生存智能，《古兰经》中更渗透着“两世吉庆”的处事策略，即使是充满世俗色彩的经商营生，也被包含在神圣信仰的追求当中。因此，穆斯林既可在身处集贸市场的清真寺里虔诚颂主，又可在清真寺旁的集市上公平交易，神圣性与世俗性如此水乳交融实属罕见。正是在“两世吉庆”观的影响下，“寺市并存”构成了穆斯林生存空间的核心，进而成为伊斯兰经济文化的基本生成模式。阿拉伯部落每年禁月在欧卡兹集市与克尔白神庙的经商与朝拜传统影响到穆斯林社区的构建，由若干穆斯林社区形成的伊斯兰城市建制也难脱神圣性与世俗性生活的双重功效；清真寺在推动阿拉伯民族由动荡分散的游牧生存转入“围寺而居”的定居生活的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尤其是乌玛社会的建立，标志着半岛穆斯林依托清真寺形成了宗教信仰所维系的全新社会关系，清真寺宗教功能与社会经济功能的相互制动，又推动了伊斯兰经济文化的生成乃至发展。

由“寺市并存”这一基本模式所生成的伊斯兰经济文化又呈现出“依寺辐射”的发展态势：一是随着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大，寺院经济将成为国家甚至世界经济的特殊组成部分；二是在宗教复兴思潮的影响下，伊斯兰经济思想不断影响着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三是在多元文化与不同经济模式的整合作用下，伊斯兰经济文化将在包容与更新中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如依托北京牛街清真寺而形成的牛街商业经济文化圈，就是在“寺市并存”基础上不断生发、辐射，最终成为在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指导下汲取中国传统经营方式而致的伊斯兰经济文化发展范式之一，并因老店新铺的“围寺经营”吸引了海内外客商，经济文化效应日益增强。

从某种意义上说，清真寺被称为隐性经济实体，“围寺而居”的穆斯林经济群体为显性经济实体，“寺市并存”则凸现出两种经济实体的依存和互补。因此，伊斯兰经济“依寺辐射”的发展与其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环境的适应与协调，也折射出清真寺在伊斯兰经济文化生成中的特殊作用。

总之，在梳理“经商、信教”文化传统的形成、穆斯林神圣性与世俗性双重生活的环境演变以及宗教伦理型经济理念的确立等基础上，探究伊斯兰经济文化由“寺市并存”的生成到“依寺辐射”的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旨在为深入思考伊斯兰经济出路等重大现实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

(作者单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责任编辑 赛勤

